

科学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内在逻辑

铁省林

(曲阜师范大学经法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

摘 要: 西方科学的理性主义传统造就了科学哲学的理性主义,但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兴起的非理性主义科学哲学思潮说明,科学哲学中非理性主义产生是传统理性主义科学观的固有矛盾所致,是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自然结果,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

关键词: 科学哲学;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4 - 0025 - 03

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个传统造就了灿烂辉煌的西方科学。理性的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理性的,理性和科学二者不分彼此,携手并进。尽管自古希腊以来,不时出现怀疑论、相对主义乃至非理性主义,但它们始终处于主流文化之外,与科学无缘,丝毫无损科学的理性形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有一些在这个理性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熟谙科学及其历史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宣称,科学是非理性的,并声言这是从他们对科学及其历史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非理性主义的出现,在科学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科学合理性问题成了科学哲学家讨论的热点,说明科学的合理性成了科学哲学的核心任务之一。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出身于理性主义传统的非理性主义者一下子抓住了科学理性主义本身固有的弱点,从内部向科学理性主义发动了攻击。因此,科学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传统理性主义科学观的固有矛盾所致,是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自然结果,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

现代科学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种子在古典理性主义知识观、科学观那里已经埋下了。正是古典理性主义知识观、科学观的内在矛盾导致了科学哲学一步步地走入了非理性主义的窠臼。在古典理性主义者看来,科学知识始于无偏见的、可靠的感官观察,科学理论是用科学的方法严格地从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的,获得新知识的方法是归纳法;科学知识是业经观察和实验的经验证据证明了的知

识,是客观的、合理的真知识。

古典理性主义的科学观正式形成于 16 - 17 世纪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产生的时期,是近代科学哲学思想的主流。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与大师伽利略和牛顿是这种科学观的支持者、倡导者和鼓吹者,他们自称自己的科学理论就是从大量的观察和实验事实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并已得到了观察和实验的证明;当时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则站在哲学的高度上,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这种科学观。结果是,这种科学观在西方近代占据了主导地位,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成了它的忠实信徒和宣扬者。古典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对于冲破圣经迷信和古代权威,争取自然科学的独立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随着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它的局限性也就逐渐地暴露出来了。

古典理性主义的科学观充满了问题。一旦人们深入思考这种科学观,免不了会问:观察经验是绝对可靠的吗?观察经验能够确凿无疑地证明科学知识吗?科学理论真是从观察经验中通过归纳方法得出来的真知识吗?归纳法是合理可靠的科学方法吗?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了构成古典理性主义科学观的两个未经审查的基本因素:观察经验和归纳方法。经过研究和讨论,人们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否定的回答,从而动摇了理性主义科学观的基石,使理性主义在发展初期就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尤值一提的是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对归纳法的决定性打击。休谟证明,归纳法只不过是人们心理习惯的联想,得不到逻辑的证明,没有理性的根据。属于理性主义阵营之内(近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

【收稿日期】 2004 - 03 - 31

【作者简介】 铁省林(1963 -),男,山东乐陵人,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经法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

义同属古典理性主义)的休谟,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彻底批判了理性主义自身的一个核心因素,得出了非理性主义的结论,这可以说打开了从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的大门。罗素曾说:“整个十九世纪内以及二十世纪到此为止的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是休谟破坏经验主义的当然结果。”^[1]

二

为了挽救理性主义,现代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作出了顽强的努力,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盛行于20世纪初期的逻辑经验主义是古典理性主义的直接继承者,为了保证科学的理性特征,它在科学观上对古典理性主义作出了两点重要修正:首先,严格区分“科学的证明”和“科学的发现”。科学的发现是指提出或构成科学的理论,而科学的证明则是指证明或辩护科学的理论。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发现和科学证明是不同的,前者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心理等因素,是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心理学家关注的问题,后者涉及到科学的确证、检验、接受等方面,是科学哲学家研究的问题。因此,科学哲学不包括科学的发现,只探讨科学的证明。因为科学发现不存在逻辑关系(即不适用归纳法),没有“科学的逻辑”,科学证明却是一个归纳检验和确证的逻辑过程,是“证明的逻辑”,科学哲学就是一种“证明的逻辑”。其次,用概率论重构归纳逻辑。古典理性主义是一种归纳主义,在休谟给予归纳法以毁灭性的打击之后,致使逻辑经验主义向概率论退却。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归纳法所证明的不是理论的必然性,而是或然性,科学知识不是确实无疑的知识,而是高度可几的、高概率的知识。所以,一种概率逻辑恰好为归纳法提供了合理性的根据。

批判理性主义的大家波普尔(Karl Popper)虽然在科学哲学的许多基本问题上与逻辑经验主义者唱对台戏,但在捍卫理性主义方面却与之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波普尔不仅同意逻辑经验主义者对于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区分,而且专门论证科学发现的过程是一个非逻辑的、非理性的过程。在他看来,科学发现始于“灵感”、“大胆的猜测”;从而明确地从科学哲学中把科学发现排除出去。(波普尔的一本主要著作虽然以《科学发现的逻辑》为名,但书中所论证的却是否定科学发现具有逻辑。)无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者还是批判理性主义者,不管他们如何拒绝科学发现,但事实上都承认了科学发现是一个非理性过程,对非理性主义作出了某种让步,后来的非理性主义者在这方面只不过是发扬光大而已。波普尔认可休谟对于归纳法的批判,而且正是波普尔提出休谟对归纳法的批判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他不像逻辑经验主义者那样,为了挽救理性主义而去挽救归纳法,而是彻底否定归纳法,以一种所谓的“假说—演绎法”取而代之。

所以,现代理性主义,不论是逻辑经验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事实上不过是对古典理性主义修修补补,试图避开被反驳的矛头,但结果则是在理性主义的道路上步步退却,越来越靠近非理性主义。

最初显露出非理性主义倾向的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是伊·拉卡托斯(Inre Lakatos)。拉卡托斯是波普尔的学生,原

属批判理性主义学派,也以捍卫理性主义著称,但他的学说本身却已向非理性主义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拉卡托斯对非理性主义的让步主要表现在他的关于“科学史的合理重建”思想中:第一,强调科学史的研究对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离不开科学史的研究,两者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套用康德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第二,区分了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承认科学的外部史对于科学内部史的重要意义。内部史是科学理论自身的历史,而外部史则是环绕着科学理论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内部史显然受着外部史的影响和制约。第三,提倡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通过对科学史上实际的科学发现和发展的典型事例研究以对科学哲学的理论模式进行合理检验、评价和重建。拉卡托斯概括道:“(a)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方法论,历史学家据此重建‘内部历史’,并由此对客观知识的增长作出合理的说明;(b)借助于(经规范地解释的)历史,可对相互竞争的方法论作出评价;(c)对历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学的)‘外部历史’加以补充。”^[2]之所以说拉卡托斯的合理重建思想表现了向非理性主义的让步,是因为他意识到,科学哲学家提出的各种合理性标准,不是不符合科学的历史事实就是限制了科学家的科学研究;不仅科学家可以违反这些标准,而且就其作为科学合理性的标准而言,它往往与科学史实相冲突,所以往往并不是“合理的”。非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保罗·法伊尔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正是抓住了拉卡托斯的这一点,指出:“在拉卡托斯的理论中,理性主义和理性的要求成了纯粹口头上的了。”^[3]“被拉卡托斯所软化的科学方法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品,它使我们忘记‘怎么都行’的立场事实上已被采纳了。”^[4]所以,法伊尔阿本德把拉卡托斯称之为“隐蔽的非理性主义者”。

三

理性主义科学观内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以库恩(Thomas Kuhn)和法伊尔阿本德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兴起。著名科学哲学家劳丹(Larry Laudan)描述了这一过程:(1)“科学哲学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定义什么是合理性)发现,他们的合理性模型在实际科学活动过程中即便能找到例证,这类例证也为数极少。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模型所提出的合理性定义,那么我们似乎不得不实际上将整个科学看成是不合理的。”^[5](2)“企图表明科学的方法保证了科学是真知识、可几的知识、进步的知识或高度确证的知识的努力——这种努力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今天几乎从未间断过——一般来说全都遭到了失败,从而产生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假设:科学理论既不为真,也非可几、也非进步、也非高度确证。”^[6](3)“科学社会学家已指出一些发生在以往(新近的或遥远的)科学中的实例,这些实例似乎指示出,在科学决策中涉及到许多非理性的因素。”^[7](4)“某些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例如库恩和费耶阿本德)证明了,科学中在不同理论之间所作出的某些决策不仅表明是非理性的,而且对相竞争的科学理论的这种选择必定是非理性的。他们(尤其是库恩)还提出,我们的知

识要有所得,必有所失,因此我们无法确定科学进步发生在何时,甚至无法断定科学是否有进步。^[8]

库恩首先否定了科学发现和科学辩护之间的严格区分,自称自己的研究“已经违反了‘发现的范围’(Context of Discovery)和‘辩护的范围’(Context of Justification)这个当代非常有影响的区分”^[9],把科学发现重新纳入到科学方法论中来,肯定了科学及其发展所包含的非理性因素。不仅如此,库恩引用了一个新词“范式”(paradigm)来指称科学,而不管范式在库恩那里有多少具体的含义(根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的统计,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至少在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上使用“范式”一词。^[10]),它的根本含义或实质不过是科学家的信念,而信念主要是一种为理性所说不清道不明的非理性的东西。由此出发,库恩得出了一系列的非理性主义的结论。其一,既然科学是科学家的信念,那么自然,科学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科学和神话、迷信、错误等也无法区分开来。他说:科学史家们“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困难,即如何区分出过去的观察和信念中的‘科学’成分,与被他们的前辈们已经标明是‘错误’和‘迷信’的东西。”^[11]其二,既然科学是科学家的信念,那么不同的科学之间就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术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理论内容不可比较。因而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知识的增长过程,后来的理论并不比前期的理论更进步,科学的革命和更替不过是科学家信念的转换。

法伊尔阿本德是比库恩更为激进的非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也是公开为非理性主义辩护的科学哲学家。(库恩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在他看来,把他看作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是一个严重的误解。^[12])法伊尔阿本德的思维轨迹是从方法论的多元论走向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然后又从相对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他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科学方法论,反对方方法论的一元论,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不存在什么固定不变的和必须绝对遵守的方法论原则。“任何一条法则,不管如何有道理,如何在认识论上根据十足,有朝一日都终会被违反。”^[13]这种对方法的违反不是偶然的现象。“相反,我们发现,它们是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其实,科学史和科学哲学最新讨论的最令人瞩目的特征之一是,人们认识到,古代原子论的发明、哥白尼革命、现代原子论(分子运动说;色散理论;立体化学;量子论)的兴起、光的波动说的渐次涌现这类事件和发展所以发生,只是因为某些思想家决定摆脱某些‘明显’方法论法则的束缚,或者只是因为他们于无意中打破了这些法则。”^[14]因此,反对方方法论的一元论使他走向主张方法论的多元论。在他看来,任何方法都有有效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绝对的,在人类发展的一切环境和一切阶段能够维护的只有一个原则:“怎么都行”。法伊尔阿本德就是从这种方法论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走向了非理性主义。他认为,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家所提供的科学的合理性模型并不总是合乎理性的,科学史上的许多著名事例也不符合已有的合理性模型:“由于人们通常认为规则和标准构成了‘合理

性’,我断定,科学家、哲学家和老百姓所赞美的那些科学中的著名事件并不是‘合理的’,它们并不是以‘合理’的方式发生的,‘理性’并不是它们背后的动力,它们并不是被‘合理地’判定的。”^[15]科学比通常科学方法论所预设的“更无条件”、“更非理性”;科学并不拥有特权和优越性,它不过是众多传统中的一种传统,它和神话、巫术、迷信、宗教等具有同等的地位、同样的特性,科学并不比神话理性;企图使科学“更精确”、“更理性”,就会排除掉科学。正因为有偏见、怪想、激情这些东西,才有自古至今的科学。

综上所述,科学哲学中非理性主义的产生是科学哲学发展中古典理性主义知识观科学观所导致的结果,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是,这并不是说超越古典理性主义只有非理性主义这一条路可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实际上,非理性主义不过是几种选择中的一种,而且也不是最好的一种。劳丹指出面对理性主义的困境,我们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1)对传统分析作出某些微小的改进,最终将会阐明并证明我们关于科学是牢固地确立在认识之上的直觉,从而证明传统的合理性模型是有价值的;(2)把对合理性模型的追求看成是一种失败的事业而予以放弃,从而接受这样的观点:科学确实是非理性的;(3)对科学的合理性重新作出分析。^[16]20世纪中期以前的科学哲学家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从而最终导致了非理性主义的兴起,而20世纪后半期的劳丹、瓦托夫斯基(Marx Wartofsky)和夏皮尔(Dudley Shapere)等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使科学哲学重新踏上了理性主义的征程。

【参 考 文 献】

-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11.
- [2]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1.
- [3][15]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5、4.
- [4]Imre Lakatos, Alan Musgrave.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C]. Londo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229.
- [5][6][7][8][16]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M].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2、2-3、3、3-4.
- [9][1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7、2.
- [10]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A].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77.
- [12]库恩.对批评的答复[A].伊姆雷·拉卡托斯,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长[C].周寄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11-372.
- [13][14]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1、1.

(责任编辑 贺天平)